**《论语》中的子贡（相关研究文章）**

**《论语》中的“子贡”形象（节选）**

作者：杨永芳

**一、巧言善辩**

子贡属言语科，以言语闻名。《论语》一书多次记录他巧言善辩的问答，显示其高超的应答技巧。如：

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，曰：“子贡贤于仲尼。”子服景伯以告子贡。子贡曰：“譬之宫墙，赐之墙也及肩，窥见室家之好；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得其门者或寡矣，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？”

叔孙武叔在朝堂上和其他大夫说，子贡比他的老师孔子强。子服景伯把话传给子贡，使子贡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。夫子是子贡最尊敬的老师，现在有人居然拿他来贬低老师。

首先，巧言善辩的子贡使用了“打比方”的说理方式，即用简单易懂、人人熟知的事物比喻抽象复杂的道理，化抽象为具体，使人理解起来既快又清晰。用“院墙”把夫子极难理解的“道”和他自己所能达到的境界，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出来。其次，使用“陪衬”的修辞手法。他说夫子之墙数仞，里面既有熠熠生辉的宗庙，又有充实富丽的房舍；自己的墙虽然只是及肩，但里面也有室家之好。以自己“墙也及肩”衬托夫子“之墙数仞”，既突出了夫子学问的广博高深，也表现了自己的成就和谦逊。说理生动有力，给人印象深刻。第三，使用“反语”的修辞手法。借助“反语”，子贡有力地回击了叔孙武叔借夸奖自己来诋毁孔子的愚蠢。他说“得其门者或寡矣”，意思是说，能找到我老师大门的人少之又少，叔孙武叔你找到吗？然后，他说“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！”表面上说，叔孙武叔您的话，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吗？弦外之音是，你的话合乎情理，不正是合乎你连门儿都没找到就胡乱评论的愚笨吗！

**二、闻一知二**

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。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诗云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其斯之谓与？”子曰：“赐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。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

子贡问夫子“贫富之人应如何修身”的问题，即“贫穷却不巴结奉承，有钱却不骄傲自大，怎么样呢？”夫子回答说：“（这样做）可以了。但还比不上虽

贫穷却乐于道，纵然有钱却谦虚好礼。”夫子说完，子贡就懂了，随即联想如何才能做到的问题。这就是子贡的聪明之处，“闻一知二”。

孔子的答案包含了对待贫富因心态不同而产生的3种境界：贫而谄，贫而无谄，贫而乐；富而骄，富而无骄，富而好礼。第一种境界：贫而谄，富而骄。这是常人的表现。一般人如果不富裕，需要的东西就会越多，得不到就会引发心理失衡；如果富裕，金钱的魔力又往往像霉菌一样，使人滋生傲慢。第二种境界：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。这种境界需要修身，是子贡所能达到的，也是夫子认可的。第三种境界：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，也是最高境界。第一和第二种境界都表现出心里特别在意贫富，巴结或者不巴结，骄傲或者不骄傲，这些心态的背后总有一个“钱”字在作祟。这种被金钱纠缠的心态很消极，容易滋生恶德，也容易扭曲人际关系。子贡虽然达到了第二个境界，但同样没有摆脱“钱”的束缚。所以，循循善诱的夫子针对子贡的状况，甚至是针对后世所有不能以正道摆脱贫富纠缠的人，提出了一种最好的方法，那就是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：贫而乐（道），乐道则心在道上，而不在贫困。富而好礼，则会按照礼的要求去做，心在礼上，而不在富贵。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，就是在追求道的快乐中，在乐于按礼的要求行事中，忘记贫富、超越贫富。

子贡达不到第三个境界，但是他“闻一知二”，老师告诉他第三境界，他就悟到了进入第三境界的方法：就像骨牙玉石必须经过切磋琢磨才能成器一样，人所当有的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的学问道德，也必经磨砺方能获得。子贡闻一知二的悟性，再次受到夫子的肯定，所以夫子说：“赐呀，现在可以和你讨论《诗》了，告诉你一件事，就可以推知另一件事。”

**三、亿则屡中**

子贡巧言善辩，闻一知二，孔子很器重他，认为他像瑚琏一样，是栋梁之材。有一次，鲁国权臣季康子询问夫子子贡的从政才能，孔子回答说：“赐也达，于从政乎何有？”意思是说，子贡事理通达，对于从政有什么难的！《左传·定公十五年》记载了子贡政事方面“亿则屡中”的本事。《论语》中，子贡通达事理“亿则屡中”的才能，体现在他的经商方面。

子曰：“回也其庶乎，屡空。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。”

孔子说：“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了吧，可是常常空乏困顿。端木赐不安本分，去囤积投机，猜测行情，竟然每每都猜对了。”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，司马迁对子贡卓越的商业才华有一番浓墨重彩的铺叙：“子赣既学于仲尼，退而仕于卫，废著鬻财于曹、鲁之间，七十子之徒，赐最为饶益。原宪不厌糟糠，匿于穷巷。子贡结驷连骑，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，所至，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”。

子贡辉煌的商业成就，不但当时之人，就是千年之后的我们，每每读来也颇为羡慕。追根溯源，子贡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，皆因通达事理，有“亿则屡中”的本事。

**四、子贡方人**

子贡生活中爱与别人作比较，言说他人是非：

子贡方人。子曰：“赐也贤乎哉！夫我则不暇。”

夫子说自己没有闲工夫品评别人，言外之意就是提醒子贡不要那样做。可是，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品说别人的话也很多，甚至还和子贡一起方人，为何却说自己没这闲工夫？朱熹对此注释：“方，比也……比方人物而较其短长，虽亦穷理之事，然专务为此，则心驰于外，而所以自治者疏矣。”朱子的注释，说明了两点：一是比较人物短长，虽然也是为了推究事理，但主要是为了“自治”，也就是自我修养。二是如果把重点放于比较人物短长，会疏忽自我反省和修身。

夫子批评子贡也是如此。品评人物认清是非，作为修身明理的手段并没有错，也正在此意义上，夫子甚至还和他一起品评子张子夏，教给他“过犹不及”的道理。但是正如朱子所言，所有穷究事物的道理，都是为了自我修养。对孔门弟子而言，所有的博我以文，都是为了“约我以礼”。孔子担心子贡养成一心向外的“方人”毛病，所以才委婉地批评他说：“我可没有这闲工夫。”

（见《晋城职业技术学报》2019年第6期）

 **《论语》和《庄子》中的颜回与子贡 （节选）**

作者：张二平

《论语》里的子贡，也有两个鲜明特点。

一是切问近思，有疑必发。如：

子贡问曰：“赐也何如！” (《公冶长》)

子贡曰：“师与商也孰贤！”(《先进》)

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, 富而无骄, 何如！”子曰：“可也, 未若贫而乐, 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如切如磋 ,如琢如磨 ,’其斯之谓与！”(《学而》)

子贡问曰：“乡人皆好之, 何如！”子曰 :“未可也。”“乡人皆恶之, 何如！”子曰：“未可也；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,其不善者恶之。”(《子路》)

子贡曰：“君子亦有恶乎 ”(《阳货》)

子贡问友。(《颜渊》)

子贡问君子。(《为政》)

子贡问曰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邪！”(《子路》)

子贡问仁。(《卫灵公》)

子贡曰：“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, 何如！可谓仁乎！” (《雍也》)

冉有曰：“夫子为卫君乎！”子贡曰：“诺,吾将问之。” (《述而》)

由上可见，子贡在治学方法上是向外用工夫的。他喜欢品评同学才性，常向孔子请教各种问题，如上所举：问一个人“贫”时或“富”时该如何自处，问自己的“善”“恶”观念应否与“乡人”的“好”“恶”取舍一致，问为“友”的道理，问怎样才能成为“士”，问“君子”有没有恶，问“仁”与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的关系等。这些问题关涉到自我、同学、朋友、乡人以及民众，是以自我为中心形成的不断放大的人际网络，而自我在德性修养上也具有“士”、“君子”、“仁”的潜能和阶次。对有些问题，子贡很有悟性，如，他由孔子“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的话，领悟了《诗经》里的“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”，受到了孔子的赞扬。

二是关心政事，长于货殖。《论语》里记载：

子贡问政。子曰: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:“必不得已而去, 于斯三者何先！”曰:“去兵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！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(《颜渊》)

子贡曰：“管仲非仁者与！桓公杀公子纠,不能死,又相之。”(《宪问》)

子曰:“回也,其庶乎。屡空。赐不受命，而货殖焉，亿则屡中 。”(《先进》)

子贡曰:“有美玉于斯,韫匮而藏诸!求善贾而沽诸!”子曰:“沽之哉?沽之哉? 我待贾者也。”(《子罕》)

比较而言，颜回贫穷、隐逸、寡言，善于体证。子贡富贵、经营、话多，喜欢问学。两人的差别很大，其哲学意义何在！冯友兰说：“一般人之论朱陆异同者，多谓朱子偏重道问学；象山偏重尊德性。……此差异于二程之哲学中即已有之。伊川一派之学说，至朱子而得到完全的发展。明道一派之学说, 则至象山慈湖而得到相当的发展。”其实儒家为学之方的分歧，远在颜回与子贡就可以看到。 程颢之学确乎源自颜回，《宋史·道学传》说：“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，所乐何事。二程之学，源流乎此矣。”在所有学生中，孔子最看重颜回，《论语》记载：

子曰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，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”(《为政》)

子贡方人。子曰：“赐也贤乎哉！夫我则不暇。”(《宪问 》)

子谓子贡曰：“汝与回也孰愈！”对曰：“赐也何敢望回。回也闻一以知十，赐也闻一以知二。”

子曰：“弗如也。吾与汝弗如也。”(《公冶长》)

孔子赞扬颜回能发明本心，批评子贡太喜欢品评人物。但子贡由于勤学多问渐入佳境，逐渐意识到孔子学说的核心，孔子对此也多有点拨，如：

子曰：“予欲无言。”子贡曰：“子如不言,则小子何述焉！”子曰：“天何言哉！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”(《阳货》)

子曰：“君子道者三，我无能焉：仁者不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自道也。”（《宪问》)

子贡曰：“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，吾亦欲无加诸人。”子曰：“赐也，非尔所及也。”(《公冶长》)

子贡问曰：“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！”子曰：“其恕乎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 (《卫灵公》)

（见《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》2009年第5期）